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 研究丛刊

清代文献辨伪学 研究 (上)

佟大群 著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清代文献辨伪学 研究

(上)

佟大群 著

《研究丛刊》总序

李文海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

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如人意，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历史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做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 and 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为新编的清史包涵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

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定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说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是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

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政治前提外，惟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分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

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清代学术概论》）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么，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的成败，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2004年4月

序 一

佟大群博士的大作——《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乃是由其博士学位论文经过精心修改而成的一部具有原创价值的学术专著。现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系列，即将出版问世，殊属可喜可贺。作者雅嘱能为之写篇序文，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婉谢推辞而是慨然遵命，所以如此不避“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之忌，盖因与这部书稿有不解之缘。我既充任过论文评阅人，又曾忝为其申请《研究丛刊》立项的推荐者，也因此有幸多次读过该书稿，算对之有所了解，理应责无旁贷，记述一下这部著作诞生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看法，恰好亦可借此平台与作者、读者做点沟通交流。是为不序之序。

是书作者大群博士，受业于著名清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白新良先生，而新良先生亦是笔者在清史学界相识相交达数十年的知友。他多年来培养了不少弟子新秀，可谓桃李满天下。承蒙厚爱，每年当其高足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时，大都邀我做论文评阅人，大群的论文也未例外。经过数年评阅下来，深感由史学界前辈、清史学泰

斗郑天挺先生奠基的南开大学历史系学风之优良与纯正。到2010年4—5月间，又收到大群以《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乍一展卷阅读，即感欣喜，一位年轻的博士学子不仅选择了这一高难度的选题，而且能将与此选题有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源源本本，条分缕析，一一论列，且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多有创新，卷帙达七十万言。能写出这样一部扎实厚重的论文，如无数年焚膏继晷，日以继夜地勤奋攻读，悉心钻研，焉能有如此成效。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不少青年学子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如畏途，犹恐避之不及，论文作者却能如此以苦为乐，孜孜矻矻，甘坐冷板凳，刻苦治学，且达到相当水平，实难能可贵。有鉴于论文的质量和作者的治学态度，因在论文评阅意见中给予相应评价，肯定“其是博士学位论文中之上乘佳作”。尔后，在由多位清史名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进行答辩时，一致通过其博士学位，并异口同声地称赞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当然，也从更高的角度，对论文的欠缺与不足提出一些进一步修改提高的意见。

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后，大群没有在一片赞扬声中浅尝辄止，而是悉心听取、综合分析了答辩中专家们提出的各种意见，再接再厉，有针对性地对论文做了修改。他为了能听取更多的批评指导，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学术交流，决心攀登更高的目标，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设立的《研究丛刊》编委会提出申请，以争取能立项出版。按照该丛刊规定，凡项目申请者须有两位同行专家

推荐。为此，作者又恳请其导师新良先生与我做推荐人。笔者在写推荐意见时，又一次翻阅了论文修改稿，看到修改稿较原稿又有新的提高。《研究丛刊》编委会认真负责地审理了申报材料，按照评审程序又约请有关专家进行了匿名评审，而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在充分肯定论文质量水平的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中肯的修改意见，表示原则上同意立项，将视修改情况再做最后决定。此时的大群又从善如流，鼓足勇气，对论文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调整，将原稿从七十万字压缩到五十万字左右，使内容更加集中，重点更加突出，直到2011年11月才最后定稿。修定稿复经编委会评审，最后终于批准立项。作者从撰写博士论文到申请立项出版，前后经历了五六年时光，这其中的冷暖甘苦可想而知。不过读者从书稿申请立项到拍板定案的过程中亦可看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编委会工作是何等的严肃认真。他们既乐于提携后进，又对学术事业高度负责，对每部列入《研究丛刊》的稿件都严格把关，一丝不苟。大群本人对其书稿，也同样认真对待，他为了邀我撰写序文，复将修定本书稿寄来，我将之与原稿两相对照，修定后的书稿质量确有很大的升华与提高。正如乃师白新良先生在是书序言中所说：“（书稿）篇幅虽有压缩，而纲目结构都更加严谨，章节部局更加合理，并且依旧保持着引证广泛、考订缜密的特色。”

笔者通过对书稿一次次的阅读，既从中领受教益，也加深了对书稿的认知，进一步认识到这部著作的优长

和特色：

第一，选题有重大学术价值，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性意义。

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地位和影响，尤以经史考据为显著特色。在考据学及其方法的影响推动下，此时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目录、辨伪、辑佚之学都有长足发展，成就辉煌。从弘扬传统国学、繁荣现代学术文化的角度，对清代学术的各个方面都值得认真梳理和总结。然自民国以来，学术界在这方面虽做了不少工作，却仍有不足和欠缺。即以辨伪学为例，前人所做的工作，大多局限于对某些辨伪学者，或某种辨伪著作进行个案性研究，对清代的辨伪学做综合全面的研究，尚无人涉足。而本文作者不畏艰难，对有清一代的文献辨伪学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写出一部长达五十万言的大著。应该说其在推动清史文献辨伪学研究，乃至对推动学术文化的研究方面，无疑都具有开拓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的价值。

第二，全书结构完整，首尾一贯，内容厚重充实，是一部有分量的清代文献辨伪学专著。全书用九章的结构，前三章首先从学理上厘清了辨伪、辨伪学的有关概念、内容、方法，近百年的研究状况，清代以前文献辨伪学的发展，以及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外部环境。中间五章着重分析论述了清代前、中、晚各个时期的文献辨伪学，不仅逐一分析了各时段的主要辨伪学者和有代表性的辨伪论著，而且论述了各时期文献辨

伪的不同特点和成就。最后一章，又提纲挈领地总论了清代文献辨伪学的体系、成就及其对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的学术展望。可谓首尾一贯，结构完整。

第三，广搜博览，运用史料丰富。作者对上述内容的分析论述乃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全书参考运用吸收了数百种基本古籍以及今人相关论著，努力做到言有所据，论有所依，而非空谈阔论。书末所附的《清以前的辨伪学者及其成就概要》、《〈总目提要〉文献辨伪成就辑录》等七篇附录，更是从浩瀚的史籍中钩稽整理而成。这些都需要下大气力，花大功夫，精心钻研，认真爬梳，既反映了作者踏实认真的治学态度，也显示了作者扎实勤奋的国学功底。

第四，勇于探索，贵有创新。任何一项学术研究既要吸收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又要勇于创新 and 超越。这一点也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如前所述全书能对清代文献辨伪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和研究，且自成完整的体系，就颇具原创价值。书中对文献辨伪学中一些相关问题的论述，也往往不为成见所囿提出个人的创新之见。如在一些文献学的论著中常将辨伪作为古籍整理的工具手段，这样的基础工作当然是必要的。不过，本书作者则从另一视角更突出地强调，文献辨伪往往体现了一个学者和一个时代的学术主张与社会思想价值取向，应将其与社会史、学术史、思想史相结合来研究，才能了解文献辨伪背后所包涵的深层思想。又如梁启超曾谓“清儒辨伪工作之可贵者，不在其辨出之成绩，而

在其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作者却提出：“在文献辨伪方法方面，清儒基本上没有多少发明，惟运用娴熟而较为全面”。再如绝大多数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学者，都普遍认为文献辨伪学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本书作者对此则不予认同，认为文献辨伪学本身理应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如此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对文献辨伪学的框架体系进行了构建与探讨。我想，本书作者提出的一些新见，学术界同行不见得都能赞同，笔者自身也认为某些看法尚可斟酌。

即以文献辨伪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而言，就值得进一步推敲。由于文献辨伪是一个传统的学术门类和治学手段，自秦汉以来，历代学人便辛勤耕耘，不用更远追溯，即从明代胡应麟之《四部正讹》而言，就对辨伪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总结，奠定了辨伪学的基础。近百年来，学术界采用文、史、哲新的学科分类后，数代学人又做了不懈的努力，写出了许多有益的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历史文献学乃至辨伪学的学科体系，且对一些问题已逐渐形成共识。而今，本书作者欲建立更新的文献辨伪学学科体系，可谓志存高远。但如何更好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全面、深入和多视角、多层次的深层思考，使要建立的学科体系更加科学、完善和缜密，似乎还有继续努力的时间与空间。我想在此研究探讨的过程中存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鸣，学术研究和学科的发展才能有更大的活力，而

不会如一潭死水而干涸沉寂。就此而论，本书作者勇于探索的尝试和贵有创新的精神，理应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提倡。

以上之所以不厌其烦的记述了本书的诞生过程，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粗浅感受和看法，意在说明一部成功的乃或是较好的学术著作的涌现，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大都需要经过反复修改，精心打磨而后成，只有亲身践履衣带渐宽、身体消瘦人憔悴的刻苦治学境界，才能到达“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令人欣慰的美好时刻。

另外，从多次阅读大群博士的书稿及近年来的相互切磋交流中，我也深感他是一位具有扎实学业功底，有很大研究潜质、能向更高学术目标发展的青年学者，倘能一如既往的执着追求，抱定为学术献身的坚定目标，就一定能在当今学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阳光沃土中，更好地发挥聪明才智，做出新的更多更大的贡献！

王俊义

农历壬辰年正月初八于书香斋

序 二

《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是佟大群学弟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近年著成的众多高质量的清史专著中一部经得起推敲、也值得学界重视的学术新著。值此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大功垂成之际，此文又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研究丛刊立项出版，实属可喜可贺。

清代文献辨伪，是清史及传统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百年以来，有关研究长兴不衰。数代学人或选取其中某个阶段，或对其中个别人物，或就其间某部著述，展开多方位、多层面、多角度研究，加之资料摘录汇编、文献点校出版等，研究成果蔚为壮观。但是，全面、深入、系统考察论述清儒文献辨伪成就之专著，却颇觉寥寥。多年来，我以教学需要，虽曾涉足这一领域并有意就此深入，却因其他课题研究缠身，迄未如愿。以此，一直念兹在兹，难以释怀。

数年前，大群学弟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几次晤谈，深觉其国学基础知识扎实，意气风发，志在高远，应能就此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传承先儒薪火。因即建议其

以“清代文献辨伪”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而大群学弟志壮气豪，即刻慨然允准。其后，即迎难而上，心无旁骛，早起晚归，夜以继日，以其全部精力，浸淫书史，遍阅古今论著一千五百余种，取精用弘，其间寒暑四易，至去年年初，终将《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杀青成稿，并于学位论文答辩之际获得专家一致好评。未久，经由专家匿名评审通过，又获清史研究丛刊编委会批准立项，决定出版。至此，始觉胸中块垒顿消，窃喜托付得人，夙愿已偿，尤庆清代学术研究后有来者，此乐何极。

根据专家意见，论文答辩通过后，大群学弟又历时一年有余，对《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书稿进行修改和补充。较之原稿，篇幅虽有所压缩，而纲目结构却更为严谨，章节布局亦更为合理，并且依旧保持着引证广泛、考订缜密的固有特色。清人文献辨伪学研究集往代之大成，成果璀璨。但因涉及面广、内容驳杂、头绪纷繁、研究成果散见多书，现代学者或视为畏途，存而不论；或浅尝辄止，仅及冰山一角；或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大群学弟不畏艰辛，对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该书兼顾通史和断代、专题和个案、通论和专论、宏观和微观、横向和纵向等关系，真正做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有体，深入系统，内容厚重，是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中的创新之作。此外书后附录，如《清代文献辨伪成就拾遗》、《〈总目提要〉文献辨伪成就辑录》、《〈辨伪书目〉未收书目》、《〈辨伪书目〉误收书目》、《清代辨伪学者及成就》等，

有对清人文献辨伪成就的客观定位，有对现当代有重要影响论著的认真考订，尤具功力与识见。世风逆转，学海扬帆。文渊浩瀚，考订诚难。青灯孤寒，数十万言。不问自知，其中苦甘！

大群学弟刚过而立之年，作为一名青年学者，进行如此底蕴深厚、牵涉广泛的课题研究，肯定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和值得推敲的问题。作为他的同调，我殷切希望他继续努力，不断进步，将这一课题及整个清代学术研究，引向深入，推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白新良

2011年10月于天津南开大学